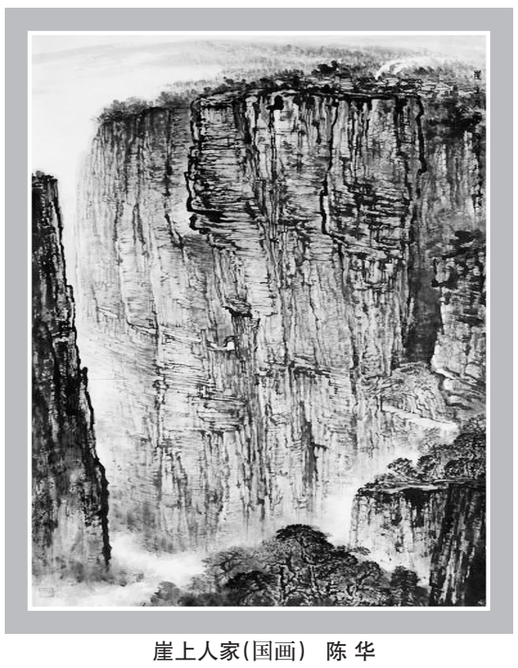


崖上人家(国画) 陈华

随笔

说“狂”

梅桑榆

人们说谁“狂”,通常带有贬义,而谁若把有些带“狂”字的词赠人,比如说谁猖狂、狂暴、狂傲、狂妄自大、丧心病狂,等等,就简直是骂人了。此外,“狂人”又作“疯子”解,谁若被人视为疯子,所到之处,境遇大多不佳。

然而,世间确有一些人被大众视作狂人,观其狂态,大约有以下数种(精神病患者除外):

一类是艺高学深,天性使然。诗仙李白和草圣张旭,皆属此类。杜甫《饮中八仙歌》一诗赞李白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又赞张旭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寥寥数语,便活现出李白、张旭豪放不羁、藐视权贵、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天子呼来不上船”,只有神仙方能如此,世间凡众,谁敢如此怠慢皇帝?“脱帽露顶王公前”,在当时是倨傲不恭,有违礼仪之举,然而在张旭眼里,王公贵族何足道哉!二人都是才华盖世,艺冠天下,故有此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气概。此类狂人,是谓真狂。

一类是缺乏见识,浅薄俗陋。井底之蛙,会觉得天大如窨井盖,而井底罕见昆虫及水生物,即使有,个头也远不及它庞大,于是顾盼自雄,视世界如无物。有一种人也如井底之蛙,在某个行当干出一点小名堂,比如发表了几首小诗,几篇小文,便以诗人作家自诩,若再出了一本诗集或小说,更是自以为李白转世,曹雪芹再生,声称自己一不小心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有的人发了横财,便满口大话,到处显摆,吹起牛来,语不惊人死不休,好像钱多得可以买下北京的前门后海,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老子有的是钱!”有的人老爹或亲戚为官,便以为有了强大的靠山,不但动辄口出狂言,而且恣意妄为,以为捅下再大的庇漏,都有人出来为他摆平。此类狂人,是谓瞎狂。

一类是故作狂态,沽名钓誉。此类人背地里大话满口,常出粪土权贵,藐视金钱之语,以显示其傲骨铮铮,超尘脱俗,似乎是阮籍、嵇康一类高士再生。然而真要见了官,却是另一副嘴脸。常见的是这样一些喜剧镜头:他正与朋友闲坐骂官,忽有长官莅临,立刻起立,笑脸相迎,递烟倒茶,满口奉承之辞;他正在大街上昂首向天,高视阔步,迎面忽然来了个能搭上话的官,他便立刻双手前伸,躬身前趋,去握官员那半伸不伸的贵手,挺拔的身躯,突然矮了一截。利无大小,遇之必争。权力要争,钱财要争,荣誉也要争,争之志在必得。因其志在必得,故往往不择手段。此类狂人,是谓假狂。

愚以为,狂,未必就是坏事,比如从事某种艺术的人,即使没达到李白、张旭那样的境界,也要有几分狂劲。这个狂劲,不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而是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或超越某些人。若是觉得这人水平高不可攀,那人作品牛不可及,创作之时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其想象力就会受到拘束,其实际才能就难以正常发挥。长此以往,其才能就可能窒息。而为人处世,则不可狂。恃才而狂者,若真是才高八斗,技艺超群,还可被人谅解甚至受到欣赏,觉得他狂得可爱,一些出奇出格之举,也可能被人传为趣闻佚事。但若只是个半瓶醋,却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不但逢人显才炫技,而且贬张三,诋李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只能令人耻笑。至于那些恃钱而狂、恃势而狂者,动辄炫富夸势,已令人厌恶,若是自恃钱势,肆意侮辱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侵犯他人的自由,有的甚至无事生非,胡作非为,对他人秽语狺骂或施以拳脚,这样的狂人,不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且可能把自己闹进监狱。

乡野眼睛

可有可无

孙道荣

在汽车送修之前,我去超市买了个大大的收纳盒,用来装车里的东西。

真没想到,车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塞着物品。驾驶室车门的储物格里,塞着一本全国地图册、好几张高速或某个城市的城区地图、一堆碎发票,以及半包香烟。另外几个车门的储物格也是满的:杂志、餐巾纸、矿泉水,竟然还有一把小锤子。突然想起来,有一年城区发大水,有人被困车中,因打不开车门被活活淹死。就是在那次大水之后,我和许多司机一样,买了一只小锤子,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所幸至今一次也没派上用场。而且,我都已经忘记,车上还有这么一把锤子了。在副驾驶台下的储物格里,有一只厚厚的碟片包,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音乐碟片,这里面的碟片我差不多都听过,有几张特别喜欢的,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后来有了mp3,这些碟片就再也没播放过了。

后备厢更像是一个杂物站:水杯、雨伞、掸子、防晒板、球拍,还有一双球鞋,一双拖鞋,一只挎包……幸亏收纳盒足够大,将这些东西都一一收纳了进去。如果不是这次彻底的清理,我几乎将它们都忘了,比如那双球鞋,就是我最爱穿的,因为把它忘在车上了,以为丢了,后来我又买了一双。但我敢肯定,每一样东西曾经都是有用的,而且,很多东西还继续可用。所以,我基本都没舍得扔。

我将收纳盒搬回家,放在书房的角落,等车修好后,我又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回了车上,放在后备厢里。我觉得,这里面有许多东西还是有用的。没错,它们终归是有用的。

已经过去很久了。车上的储物格里,又相继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而放在后备厢的那只收纳盒,我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差不多又一次把它忘掉了,我甚至记不起那里面到底都收纳些什么玩意儿。

我办公室的角落里堆着两个大纸盒,那是我前后两次搬办公室时分别留下的。每次搬办公室,我都会找来一个大纸盒,收拾好文件柜和办公桌抽屉里私人的物品,装进去,用胶带封好,再搬到新办公室去。工作不会因为搬办公室而停下,所以,往往刚搬到新办公室,就会有新的工作找上门来,应接不暇,甚至来不及收拾。我瞅瞅封好的大纸盒,心想,等到什么时候清闲下来,再慢慢整理你们。也许总是很忙,也许并不需要急着打开它们,总之,大盒子一直安静地堆在墙角,一年又一年。直到再一次搬办公室,又来了一只新的大盒子,然后,一起被搬到了另一个新的办公室。

偶尔,我会对着两只大盒子发呆,好奇里面都有些什么宝贝。一定都是些有用或者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吧,不然,我不会把它们收纳进去。但是,似乎它们又是可有可无的,否则,我怎么可能不急着将它们从纸盒里释放出来,而没有它们,我的工作和生活,好像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其实,除了办公室的两个大纸盒,汽车后备厢里的那个收纳盒,我家里柜子、抽屉、箱子里的很多东西,它们也都是有用的,必需的,但很多又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我们常常会在自己家里,因为一个偶尔的发现,而又惊又喜。

我恍然明白,抽屉和盒子里的东西,是有用的,也大多是可有可无的,并没有什么是必需的,放不下的。想到这儿,忽觉浑身一阵轻松。

观瀑图(国画) 张继强

郑地风物

汴梁瓜与北京酱

连航

汴梁西瓜是开封的传统特产,因皮薄汁多,瓢沙脆甜,清利可口而驰名古今,畅销中外。民谚“肖县石榴砀山梨,汴梁红到皮”说的就是开封的西瓜。

据说,西汉时期,王莽追杀刘秀到开封县的杏花营村时,一个卖瓜的老汉十分同情刘秀,憎恨王莽,于是就拦下王莽让他吃瓜解渴,以此拖延时间,之后又反指方向,让刘秀脱险。刘秀推翻王莽后,得知是老汉用西瓜救的驾,就请老汉进京。老汉一辈子种地卖瓜,不求富贵,就推辞了。刘秀为了报恩,就搜集了全国优良的西瓜品种送与老汉。老汉精心筛选,最终培育出适应开封沙地的瓜种。时至今日民间还有“开封西瓜甲天下”的说法。

伏天来临,农村许多人家都会用西瓜、大豆晒一盆西瓜酱(也叫豆瓣酱,豆糁儿)。奇怪的是,北京人不但能做这样的酱,而且味道也和开封的十分相似。知情的人都知道北京的西瓜豆酱是从开封传过去的。

相传,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反”,直到和洋人讲和,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回北京。回京途中路过开封,河南巡抚松寿一心巴结慈禧太后,就遍找山珍海味,顺便在餐桌上配了些开封名菜、小吃。这天,端上来一碗西瓜豆酱,太后见西瓜豆酱红溜溜,稀松松的,就动筷子尝了尝,感觉味道不错,就顺手拿了个馒头蘸着吃,边吃边说:“好菜,好菜。”回京后,太后对开封豆酱念念不忘,就派太监李莲英带人到开封学做西瓜豆酱。之后,慈禧在北京也能吃上开封的西瓜豆酱了。西瓜豆酱的晒制方法就在北京传开了,并传至国外,日本就以西瓜豆酱为调料做大酱汤。如今在日本还有“每天一碗大酱汤,不用开药方”的说法。

文学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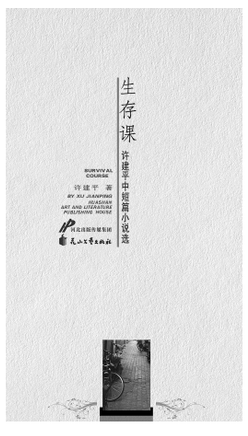
小说郑州

红都

我始终认为,我们对一个城市的了解,以及一个城市所焕发出的独特韵味,来自她的文学艺术。换句话说,是文学艺术赋予一座城市以魅力。从狄更斯和麦克尤恩我们了解了伦敦的今昔;巴尔扎克、左拉、欧仁·苏使我们认识了巴黎的秘密和狂乱和丰厚,及至海明威到达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更使无数怀揣梦想的文艺青年趋之若鹜;帕慕克使伊斯坦布尔充满了神秘古老的气息,令人着迷;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传奇、荒诞而幽深。

在当代的中国,可以说,王朔是北京的书写者,贾平凹是西安的书写者,王安忆是上海的书写者,苏童是苏州的书写者。笔者居住郑州,深爱着日新月异的这座中原名城,然而,与其开埠三千多年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相比,我一直认为我们缺少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郑州。直到最近,我集中阅读了许建平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选《生存课》(花山文艺出版社,40余万字),我才意识到是自己孤陋寡闻了,原来我们郑州也有自己的城市小说。许建平就是郑州的书写者。

建平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经在遥远的西部城市工作,他自小和爷爷奶奶在郑州最古老的城区长大,一直到他考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市民阶层及三教九流,熟悉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情感方式,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熟悉他们的智慧和诙谐、崇高和猥琐、欲望和狡猾;同时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一方面是独立、懂事、家常、幽默,一方面是细致、敏锐、浪漫和忧郁。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几乎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了。因此,当他拿起笔来,当他从诗歌创作转入小说写作时,显得得心应手。



《生存课》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描写的无不是他的两篇获奖中篇《永远的夏天》和《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也均出自这个系列。它让我们想起苏童的“香椿树”,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头混混或歌厅老板,知识分子或暗娼,孤独的老人或浪漫的少年,老江湖或愣头青,无不活灵活现,无不透露出我们城市的变迁。

这些作品是沉静内敛的,但表面上的冷静掩盖不住对温馨和诗意的追寻,因而散发出浪漫怀旧的情调;这些作品是深邃残忍的,当作品中的画画(《画画》)突然拿着刀片划下去时,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它似乎是划向我们的内心,这让我想起了福楼拜手拿手术刀的那幅著名漫画;这些作品又是智慧幽默的,当黄段子大师(《大师》)讲出他的著名段子的时候;当那位丈夫(《情人节》)手举玫瑰在大街身边熟悉的生活,而思考的无不关乎我们的生存。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槐树街”系列,最是让人难忘,上奔跑的时候;当小公务(《萝卜白菜》)因为一点儿可怜的情色沉迷,麻烦上身后又寻求“私了”的时候;当胜利(《断指》)为摆脱困境,向昔日老友借钱的时候;当父亲(《生存课》)在去吊丧的路上,对儿子面授生存智慧的时候……不由你不笑,但你又很难把笑声发出来,你分明会感到来自心灵的荒凉和来自骨头缝里的寒气。

我还没有看到谁会这么逼近我们生活着的城市郑州,这里的迷乱疯狂、挣扎喘息、喧哗躁动、五光十色都表现得如此真实;这里的痛苦忧伤、胆怯软弱、恐惧孤独都表现得如此贴切;这里表现的对城市既依恋又疏离的奇特关系,不正是对你我最真实的写照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平描写郑州的作品又远远超越了郑州这座城市,她像一道光,照亮了城市的夜空,直达城市人内心的隐秘之处。

从表面上看,建平是疏离和散漫的,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不安甚至是焦虑的。这源自他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执着和梦想。我一直以为建平其实一直生活在文学中,他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种文学状态。他讲述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其实都经过了文学加工,都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建平超强的记忆力、深入细致的观察力、讥诮刁钻的言语和丰富的阅历,都让我十分羡慕。有时候,我打量建平平静、温暖、略带伤感的眼神,听着他的讲述,我会说,写下来吧,写下来就是好小说。我希望,《生存课》的出版是一次总结,更是一次重新出发。因为我相信,建平可以写得更多、更好。我更相信,许建平是郑州这座城市称职的讲述者。

新书架

《进攻日本》

余向丽

这是国内首部揭秘美国投掷原子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通过大量的第一手历史档案文献、照片、亲历者口述及无可争辩的数据,全面展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中国和东南亚等的“超级大屠杀”,并证明,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1945年8月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此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做法都是无比正确且正义的决定。

并且,作为二战亲历者的雷蒙德·戴维斯将军和丹·温法官(作者),无法忍受修正主义者的诋毁,进一步揭示了在战后,日本政府是如何一边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进行控诉,一边悄悄用各种手段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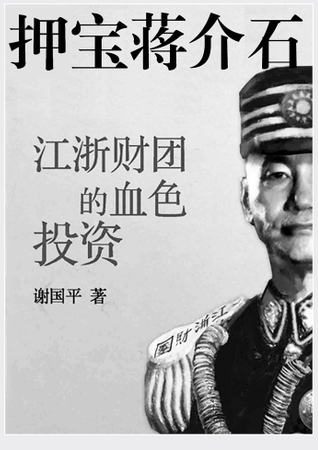
该书也提醒人们:“假如我们对(修正主义者)这种谬论不加反驳,假如我们继续等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和投掷原子弹的当事人都离开人世,而只让日本人继续扭曲二战和原子弹的真相以及日本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真相就会全由日本人垄断解说了。”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 著



这些消息让陈光甫很忧心:工人不好好干活,动刀动枪的,工厂不像工厂,银行不像银行,那实业界还有什么希望?工厂办不下去,银行也就办不下去。深受西方教育熏陶、讲究规则和法律的陈光甫自然不喜欢梁山好汉式的快意恩仇。

还有,上海银行武汉、长沙分行已经有了职工会,职工会里不会有枪吧?陈光甫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相信绝对不会,因为他从开业起就反复教育员工:“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这一年,为了安全起见,陈光甫已经陆续关闭了各地十几个分支机构。

1926年的冬天格外阴冷,外面起了风,呼呼作响。

飘摇中,他必须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此时,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不断地将南方的情况通过电报发给陈光甫。

这位个子不高、超级精明的银行家也是江浙财团的中坚人物,有着不一般的政治智慧。

贝祖诒的父亲贝哉安是陈光甫的好友,在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曾对他出手相助,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随后担任其苏州分社经理。

贝哉安有5个儿子、4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可谓教子有方。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三子贝祖诒。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25岁时,贝祖诒成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创始人,后又兼任广东分行总经理,可谓年少得意,事业有成。因为驻站南方,贝祖诒对广州的形势更清楚,陈光甫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8月31日,贝祖诒来电称:“北洋军阀诚如尊论,已等于晚清之绿营,暮气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国之福。”

言下之意北洋势力气数已尽,中国银行绝不能为其陪葬。

9月29日,他来电认为形势不明:“日来消息似南军在赣鄂边界略为失利,究竟是否系诱敌深入,以备一击歼灭之计,抑真为孙军所败,不得而知,但两方实力尚未接触,可为断言。”

这时蒋介石和孙传芳正在江西南昌激战,未分胜负。蒋介石心高气傲一味蛮攻,孙传芳部则顽强抵抗。

到了10月,军事形势已经明朗。18日,贝祖诒又来电:“粤方之意本以得赣为限,长江北部须俟整理就绪再行解决,中央政府原拟设在武昌。惟目前国民党开代表大会,忽主中央政府暂行留粤,不移武昌,意或须俟南京下后再谋迁宁亦未可知。”

12月初,贝祖诒又到九江、南昌和汉口打听详情后,从武汉发来电报,对时局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上游军事必须肃清,使商货源源流通,庶汉皋金融得以活泼。第二,财政收支必须相抵,万不可以金融界为筹款之门径。第三,劳资必须兼顾,使商界安居乐业,万不可有偏袒之弊。”[《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也就是说在长江一带北伐应尽快结束,以便商人做生意,因为打仗使得武汉市面很萧条。二是政府不能乱来,出了财政赤字不能打银行界的主意。这一点贝祖诒比上海的银行家们更敏感,也更有远见。三是劳方资方是手心手背,政府不能光顾“扶助工农”而打击商人。

贝祖诒忧心的是此时上海商人,尤其是各家银行经理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他发电报告诉陈光甫,并央求他把自己的观点私下告诉身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字公权)。陈光甫和张嘉璈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人都是海外留学回来,所学都是经济,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几乎每天他们要交换一下对时局的看法。

于是,陈光甫对着电报沉吟了半天,拿起电话拨通了张嘉璈的号码。

这真是中国商界精英们的不幸,将大半的精力用于应对变幻无常的政治局势。

其实,对于政治,作为生意人的陈光甫并非敬而远之,他也不是一根脑筋的清高之人。

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他就和虞洽卿等人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带着沪军政府都督陈其美的公函去苏州,成功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

1913年,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时身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是支持孙中山的。可是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下令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当他听说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其开支来自设在上海的江苏银行,一怒之下下令追杀陈光甫。

追杀手令恰好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看到。张与陈光甫是故交。江苏光复后,他曾经在江苏都督程德全下筹办民政,陈光甫当时为程德全管理财政。张了解陈的为人,且两人又是江苏同乡,自然有心救他。

张一麐便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说情:“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

袁世凯这才作罢。

之后张勋到江苏担任都督,陈光甫又因坚持银行的规矩得罪了张勋。主政江苏银行的经历,使陈光甫认识到在这种官办银行中任职,就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可言,更没有任何理想可言。于是,他决心创办自己的银行。

在1915年6月2日开业仪式上,拮据的陈光甫不敢办酒席,只能略备茶水应付过去。他后来回忆道:“连开幕时,不敢邀请钱业董事长朱五楼,恐遭其拒绝不来,可见其时狼狈情形。”

所幸在这期间,陈光甫得到了“贵人相助”。

1915年年底的一天,一个职员进他的办公室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来人正是当年留美同学孔祥熙。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告诉他:“中山先生委托我,给上海银行送来股金。”

陈光甫听后深受感动。原来,上海银行正在融资扩股,而此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于是在上海银行的档案中,留下了一个叫“孔庸”的股东户名,股份10000元。

随着孙中山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著名的宋家老太太,也就是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投来5000元股金。